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4~16

2014年4月16日

邓英淘《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 读书会摘要

杨莹整理、王小强删节¹

张木生：今天主题是邓英淘提出的“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

80年认识邓英淘，对我来说，他是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人。用毛主席说法最贴切，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他不是很好接触，太严肃，用尽了毕生精力做学问。概括说，是一个既知世界大格局，又特别善于和中国具体现实相结合的人。80年代他写〈论战略思维〉，就具备了这样的眼光。他的结论是不是都正确需要论证，需要时间去检验，但战略眼光和战略思考总是超前，总是为大多数人着想，

¹ 2014年3月16日下午，在北京富成花园金鼎俱乐部举行邓英淘《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读书会，本文根据录音和现场速记整理、删节。

这一点我们很容易形成共识。我们就沿着这个思路，请王小强介绍邓英淘垂死挣扎的三本书，他跟最后时期的英淘接触最多，帮邓英淘整理的东西最多。

王小强：邓英淘，2012年3月11日去世。非常感谢大家以读书会形式纪念他逝世两周年。像上次孔丹读书会一样，先讲讲书的来历。在座的应该都有了要讨论的三本书，或者看过访谈〈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这三本书之前，邓英淘成立“水资源调配与国土整治课题组”。给大家提供这篇〈壮哉人生邓英淘！〉后面有个著作目录，《再造中国》、《西部大开发方略》、《西部大开发调研实录》、《西部大开发调研实录之二》、《林一山纵论治水兴国》、林一山《河流辩证法与冲积平原河流治理》，共六本书；另外还有一本没列在这里，邓英淘和崔鹤鸣参与，林一山《中国西部南水北调工程》，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今天讨论的这三本书，是在上述七本书之后，这是我想交代的一个概念。在访谈里也提到，在“水资源调配课题组”之前，他一直对农村的沼气等新能源案例进行调研，薛玉炜都参加了。所以，邓英淘这本《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的背景，是十本甚至超过了十本书的一个浓缩。

超过十本书的这些调研活动，当然不是邓英淘一个人做的，所以非常高兴见到一些参加过邓英淘调研活动的老朋友来到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崔鹤鸣“崔老汉”，我们课题组自己开玩笑叫“三老汉战斗队”，当时我们跑遍西部，三人都已年过半百，崔鹤鸣是我们三老汉里年龄最大的一个老汉，曾在西藏修过墨脱公路。他在我们三个人的分工里面比较多地侧重调水，因为他的特长是工程方面。如果今后有读友想要进一步探索，或一会儿讨论工程，可以找他。

薛玉炜，原来也是体改所的，以后一直追随邓英淘，早期的调研工作都参加了，到跑西部的时候，工作安排其他事情。但是后期，跑完西

部以后，参加了河南、河北、安徽、湖南、山东、内蒙等所有调研，较多侧重新能源方面，应该也是专家了。

杨莹，水资源调配课题组秘书，参加过陕北、内蒙和辽宁的调研。我要表示感谢的是，邓英淘 09 年癌症手术后，我们研究部多次全体加班加点，赶制这三本书，每次都是杨莹把带着墨香味的新书，送到了邓英淘的病房。这三本书，杨莹辛苦。

梁晓，我们研究部的，提供给大家的〈靠不住的国际油气资源〉是她写的，她用这篇文章纪念邓英淘去世两周年。梁晓一直在香港，没参加调研，甚至没见过邓英淘，今天读这本书的英文前言是梁晓翻译的，而且英文版从头校到尾，因为翻译者是英国人，许多术语和表述上不清楚，梁晓做了很多工作。通篇文字，字斟句酌，反复推敲。

吴宁，参加了四川、山西调研，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松潘，她得了非常严重的高山反应，想回来都不知道怎么回来，只能坚持到底。她对邓英淘也非常有感情。

刘靖，中央电视台二频道《财经评论》主编，99 年把我们开的“南水北调”研讨会，作为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播出。她参加过我们青海的调研，派高强参加我们陕北的调研，一直想拍西部大开发的纪录片。

黄晓京，发展组、体改所的老朋友，这本书的日文版翻译、编辑，组织出版，日文版的前言是他写的。和梁晓一样，通篇文字，字斟句酌，反复推敲。

梁中锋，帮忙我们在上海文汇出版《再造中国》和《西部大开发方略》。这两本书，尤其后一本，是课题组当时调研成果的集中体现。

鲍静，这三本书在大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鲍静是责编。

最后感谢张木生。80 年代初，“发展组”有个“核心领导小组”，组长陈一谔，现在美国病重，何维凌去世了，邓英淘去世了，就剩我俩在北京。97 年我在体改委大打出手，98 年体改委要求我离开。张木生

把我接过去，又给办公室，买吉普，又给配人，支持我们进行西部大开发调研。当然了，调研还有其他经费来源，包括南怀瑾赞助 50 万，王岐山找广发证券出 50 万，康典给了上百万。

今天主要围绕的这本书，很有意思。91 年中信出版社出版《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20 年过后，大风出版社再出，除个别错别字，只字未改。访谈里说了，邓英淘提出这个问题是 84 年，这本书代表了他 80 年代初的考虑，而这个访谈，又是他最后的思想总结。这三本书，先出的《再造中国，走向未来》，然后出的《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前两本书出完，已到了邓英淘的最后阶段，才有了《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前边 70 多页的访谈。提出这个问题到回答这个问题，完成他人生的学术总结！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特别有意义。

围绕这三本书，我把我对邓英淘思想的理解，高度简化，汇报三点。首先从思想方法上，邓英淘 80 年代初就提出了一个所谓“三体”问题。上次读书会，孔丹说他是实事求是派。他这个提法很平实，所以很值得琢磨。遥想 80 年代，那时候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得有第五个现代化，这道理对不对？高明不高明？普世价值？别人不知道，至少我参加发展组的基本出发点，非常简单，我们都在农村插过队，当时的愿望就是让种田人吃饱肚子，吃饱了才敢想别的。搞“包产到户”，吃饱了肚子，邓英淘就开始用“三体”这个概念考虑问题了，就是体制改革、发展方式和国际战略格局，三位一体。

国际战略格局复杂吗？一点都不。发达国家不到全世界 20% 的人口，消费将近 70% 的能源；美国不到全世界 5% 的人口，消费 20% 的能源，这就是既定的战略格局。我们要想现代化，你就得面对这个实际。当时邓英淘就开始算账了，80 年的数据，中国人均消费能源 0.6 吨标准煤，美国 11 吨，发达国家最低的日本六吨。先别说几个现代化，中国如果过上美国人的日子，十亿人口就是 110 亿吨标煤，而 80 年全世界

能源消费的总量是 86 亿吨标煤。

30 多年过去，2012 年我们人均消费 2.8 吨标准煤。多少年了，世界新增的能源消费 80% 多是中国和印度。我们现在能源消费世界第一。邓英淘提出这个问题时，石油出口还是中国换汇的主力，现在石油进口依存度 60%，不言而喻，国际战略格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有没有可能和平发展？大家可以看梁晓这篇文章，证明了邓英淘的一个思想，这也是我对他特别感动的地方。他第二次住院，骨瘦如柴，极其痛苦，每天面对死神，嗨，交给我《参考消息》上法国人的一篇短文，目光独到，炯炯有神，美国的“世界新秩序”包括搞乱油气资源地。打了阿富汗，并不是培养一个亲美政权，对美国言听计从、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走，那你不就得帮忙经济繁荣了吗？尤其明显的是打了伊拉克，没在当地建立一个稳定的亲美政权，使得伊拉克跟着美国走。而是什什么？是乱了，无休无止的各种动乱，伊拉克的石油，就存在那儿了。

按一般道理，如果是和平发展、市场经济这个逻辑，应该是油气资源越来越少，油气价格越来越贵，然后像油页岩、可燃冰、煤变油等这些替代的能源，由原来的不合算变成合算，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替代过程。这个过程发生了没有？从总趋势上来说，在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二战结束后到石油危机前，直到 70 年代，石油两三美元一桶，现在已经 100 美元以上，将来 500、1000 美元的时候，肯定替代能源就有了。在这个大趋势下，帝国主义的理性选择是什么？就是即便我现在一时用不了，也不能眼看着让你敞开来用，把有油的地方搞乱，别人也用不了，将来我可以慢慢消费。梁晓这篇文章用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生动证明了英淘的这个判断。尤其像利比亚，本来和西方缓和，搞得好好的，突然乱了，然后卡扎菲自己也被搞掉了。唯独中国三万人撤侨，凤凰卫视有个数据是三百亿美元投资泡汤。

补充一下，中国过去戴着贫油的帽子，传统地质学结论，石油是

海洋生物來的，中国没有形成油田的可能。所以封锁我们，以为肯定得屈服。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硬是从李四光创立陆相沉积生油理论开始，到找油、勘探、打井、采油，像大庆的三次采油，常识上理解就是拿高压把水和洗衣粉灌进去，把犄角旮旯的油全给你洗出来。别的产业可能说得向跨国公司学习，唯独石油工业，谁也比不了中国。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中东这些大型整装油田都在美国手上，美国的中央军区总部在卡塔尔，我们不可能到那儿分一杯羹，我们就去了非洲。非洲理论上是有油的区块，从二战后到现在，早被西方石油公司扑腾过很多年了。我们再拿着这块那块人家玩剩下的，开始重新研究、勘探、打井。梁晓文章有些段落描绘得很鲜活。在西方多少年找不到油的地方，我们找到油了，形成量产，建设好码头、输油管、炼油厂，等开始往回拉油了，乱了。像南苏丹独立，美国第一时间承认，南北苏丹交界部分就是我们找油和建设的重点。我们和非洲打得火热、越来越有希望的时候，美国在中央军区之外，突然成立非洲军区，第二个海外军区，驻军，军事存在，访谈里引用过许多美国政要的观点，公开、直接、明白无误地不允许中国在非洲闹油。

既然有市场调节，为什么叫战略格局？因为资源，有战略意义的能源供给，不是市场调节出来的。论军事实力，我们的海军跟俄罗斯没法比。偏偏美国重返太平洋，60%的海军放在西太平洋，东海、南海，闹什么呢？这个现实，邓英淘 80 年代初就有预见性地指出了，这条路怎么走？能走多远？这么一条“两头在外”的路，能源、资源在外，保持 7~8% 的增长速度，继续保持这么大量增加的能源消耗，这种日子还能有多久？

再看另一面，我们辛辛苦苦、忍气吞声、高价费劲闹回来能源、资源，譬如铁矿砂，实现经济增长。今天我们变成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出口国，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美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进出口相当于

GDP 比重不到 20%；日本是所谓“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资源在外、市场在外，日本也是 20%；中国，70%，三倍！史无前例的程度上依赖国际市场。廉价劳动力挣回来小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假定一万多亿美元资产，人民币升值 30%，就是三四千亿美元“削债”了。所以，邓英淘总结《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最后有一句非常重的话：“旧的发展方式和工业化之路是以点块聚集的不可再生能源为基础，是从减弱生物圈质能循环中获‘利’，这是少数人发达和现代化之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条死路。”² 这是想说的第一点，邓英淘 80 年代初提出的“三体”问题，走到今天没有解决，或者说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邓英淘给的答案是什么？西部大开发。这是想说的第二点。他经常挂嘴边的一句话，从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划一条线，西部 10% 的人口和生产力，东部 90% 的人口和生产力。钱正英有句名言，960 万平方公里国土，90% 的人口和生产力集中在不到 100 万平方公里的平原，每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防洪救灾。我们的矿物资源和水利资源大部分在西部。发达国家像英国、法国，水利资源利用率基本达到 90%，我们一直是 10% 多。按道理，从世界屋脊到海平面，咱的水利资源最丰富，可是大部分集中在西南的崇山峻岭。新疆 160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东南沿海 14 个省区的面积总和。钱正英说的这个现实不改变，东南沿海能否承载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

所以，我们跟英淘一块做的西部大开发调研，就是想调水。我们第一本书原来叫《再造一个中国》，就是从钱正英这句话来的。如果我们再搞 100 万平方公里平原，那不等于又造了一个中国？去过新疆，包括内蒙、青海，可能都有这个概念：什么都不缺，只缺水。光热条件，平

² 邓英淘：《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香港）大风出版社 2011 年，第 216 页。

坦程度，只要有水就是绿洲。再看我们西南每年六千亿方纯净水，白白流出去，相当于十条黄河没有利用。

中国的地形是西高东低、南高北低，开玩笑说起来，就是两座山，愚公移山，一个唐古拉山，一个昆仑山，水过不去了，西北平原用不上了。所以邓英淘绞尽脑汁研究调水的事。西部大开发，无法回避的现实是，西部不调水，现有的生产力和人口规模都维持不住。我确实很难理解，有四万亿来刺激经济，工程上，能够规划上马打通渤海湾的海底隧道，怎么就不能更积极考虑西部调水呢？邓英淘研究的结论：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梦想真能实现，非西部大开发不可。

第三，想讲讲西部大开发在社会组织形态上的重要意义，即邓英淘提炼的三个机制组合：互惠、科层、市场机制。看过书的人都能理解，互惠机制是平等互利、互相帮忙，不那么计较，长期合作，短期利益算得不那么清楚；科层机制是上下级金字塔，公司一般都是科层；市场机制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资本主义作为席卷全球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是由工业革命来的。工业革命的动力是煤炭、石油等分布非常集中的矿物质资源，大规模开发利用，一次性消费，不可再生。这种集中的矿物质资源，稀缺，“可专有”，就是我用了你不能，所以市场交换、战争争夺。开发矿物质资源，你一个两个人根本动不了，必须大公司，来科层机制。换句话说，随着不可再生的矿物质资源逐渐枯竭，资本主义就走到头了。所以马克思坚信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暂时现象，寿命明摆着不是福山说的“历史终结”，而是资本主义很快就要终结。倘若随着矿物资源日益枯竭，替代发展风能、水能、太阳能等可以永续利用的能源，经济基础从市场交换集中开发走向分布式利用。新能源革命带来的发展方式，利用阳光、风力，无穷无尽，不稀缺，用不着争，到处都用，你有我也有，用不着大公司，也没法市场交换，套用马克思的话正是“物质极大丰富”！走到这个方向，物质极大丰富的资源分布式

利用，社会组织形态占主导地位的基本逻辑，就有可能回归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经济，大家都可以在小范围内自给自足，相安无事，天下太平。这种形态，在现有技术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很有可能形成。譬如现在的微信，不就是鸡犬相闻，视频电话，老死不相往来？朋友圈不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我喜欢你就跟你多聊，我不喜欢你拜拜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离开谁都能活。也就是说，建立在新能源革命基础上的发展方式，不必须丛林法则，对世界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光明的前景，更加和谐的前景。有人说这是乌托邦，我说不完全是。

美国的新能源法案，2020年，六年以后，25%的汽油都从玉米等生物质中提炼。瑞典2020年，也是六年以后，实现无油国。当然，极北的地热条件咱比不了，但他们用大量生物能、太阳能、水能和风能，无油气，少污染。朋友聊天说到“永续利用”，天下有这好事儿吗？我说有啊，都江堰，战国晚期的工程，李冰父子两代人修完，灌溉面积一百万亩，成都平原从此成为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到汉武帝，两百万亩；以后不断修，不断增加，明清时六百万亩；解放初，因连年战乱退到两百万亩；到共产党手里，60年代六百万亩，98年突破一千万亩，现在是1200~1300万亩，前景呢？两千万亩。就这么一个工程，两千多年时间，专制体制、封建割据、农民起义、外族入侵，经历过多少“顶层设计”？一直在普渡众生，永续利用。

邓英淘畅想塔里木，真是一个美景。塔里木盆地，周围几十条河流，如果有水过去，再把几百亿方地下水充分利用，50万平方公里啊！江苏省十万平方公里，浙江省十万平方公里，如果能把塔里木开发出来，周围十几个都江堰，加上沙漠的太阳能、风能，如果这些都搞起来，大家想想会是什么概念。邓英淘的这个思路，梁晓有篇标题叫做“给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指明了方向”。不仅如此，发达国家过去是八国联军，现在是八国集团，世界还有非洲、印度、南美那么多穷苦的多数人，如

果中国人能够把这条路走出来，邓英淘，不仅是给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指明了方向，而且是给人类社会的继续进步指明了方向。

崔鹤鸣：我 76~79 年在西藏，参加了墨脱公路的建设。79 年到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80 年前后参加了发展组的一些活动，跟邓英淘、小强、木生都认识。84 年我到发展组找罗小鹏，从他转述中知道英淘说的“多数人的现代化”。当时不是这么表述的，但意思差不多，多数人现代化是没有办法走现成的欧美模式的，提到了汽车、能源及若干种物质产业。当时我整个思想还是线性的进步观，基本假设是只要有问题，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要这个问题出现了，人类就会想出办法来把这个问题解决，用不着担那么远的心，与邓英淘这个观点不太一样，但我没跟他当面讨教。后来又到处改所、下海，跟小强参加了一些别的课题，最后跟英淘、小强等一起搞上了西部大开发调水。对我来说，真有一种宿命的感觉，就是缘份。我本科专业是道路，到西藏搞崇山峻岭公路施工，对这种大工程有想象，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人大读研是学工业经济、基本建设经济，倾向发展经济角度。到体改所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又跟这个课题合在一起了。到做西部大开发时，对英淘这个想法已有了相当深的体会。英淘的这种思想方法，是要克服线性的进步历史观，不是有什么问题就会有什么办法来解决，现在用不着操那么多的心，实际上一切问题都是我们操心解决的，如果不操心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邓英淘操心的一些问题，我们到了 21 世纪才开始研究，但他是在 80 年代，那时还是毛头小伙子，他怎么就操到这个心上去了呢？当初我还真不理解。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从世界各国来说，好像都摆脱不了少数人富、多数人相对贫穷的状况。好像是一种市场秩序，或者说在世界范围内，我们之所以有这样强大的生产力，正是因为

有少数人走在前头，大多数人跟在后头，有少数国家很富，大多数国家想寻着那条路跟上去，但跟不动。原来八个工业化国家有多少人？这路是现成的，没有说哪个民族不想跟，是跟不动。特别是中国这 30 年的发展，好像也是少数人先富，多数人是不是后富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不是必然的。所以多数人现代化这个课题有更深层的意义，不仅从物质生产这个意义上算资源、能源、环境承载力。这条路全世界没解决，它不仅仅是一个资源的问题。

第二说说调水。调水是西部大开发绝对的关键。当然，像现在这样一般性发展，调不调水好像也不关键。大开发指的是让西部变成另一个中国，在这个意义上调水绝对是关键，甚至是唯一的关键。在中国西部来看，调水唯一来源就是青藏高原这块产水区。这个产水区有两个问题，一是如将水调到新疆盆地，成本是否能承受？那要看水谁来用，有人说城市用水可以承受，但城市用水非常有限。如果调的水不能用于农业，也调不多，再造中国谈不上。再一个就是环境。这一块环境过分脆弱，绝对是地球上第一的崇山峻岭，绝对高度、山峰山谷高差都是世界第一。我自己修了三年的公路，是修了毁，毁了修，死了很多人，炸死的、雪崩的、塌方的都有，而我们那个时候这条路的设计也不过就是双向能错车而已，才几公尺宽，就把边坡破坏得一塌糊涂。最早郭开提出朔天大运河概念，我觉得彻底不现实，他不知道一条几十米、上百米宽的河或者路在如此崇山峻岭中穿行是什么概念。我谈的不是工程量的概念，工程量只跟钱有关，是环境问题，是会把山破坏成什么样，恨不得要把整个崇山峻岭给填里头。我觉得环境问题，再加上少数民族区对环境问题尤其敏感，要把它提高到一个政治高度。后来英淘、小强我们就追踪一些信息，必须要有新的技术投入，才能解决这一类问题。比如廉价的风电发电技术、隧洞技术等各种各样的技术能跟上，才有可能产生一个调水方案，这个调水方案基本是在地下，不碰这个山，

一条线路可能变成十条线路布置，化整为零、化大为小，像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如果你把线路集中在一条上，在环境意义上是不可取的，在工程意义上也是不可取的。只有这样一个前提，才能够真正实现所谓西部调水，调的水量能够达到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立方米，就真有可能把几片沙漠开发到一个相当的程度。

最后，归结到刚才说的成本。从纯财务核算意义上讲成本我相信算不下来，上千亿立方的水，你有几个北京、上海，也用不到一百亿立方，无论如何要供应农业，而调水的成本你怎么算也算不下来能够在农业上用。我的观点是把调的这些水看作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好像养了一支军队。这样承担调水的成本实际上是用调的这一千亿方水所实现的西部经济发展的全局来比。假设西部现在是一万亿 GDP，调了一千亿立方水，西部的经济、生态、城市宜居等各方面都有了巨大的、本质性的改观，GDP 变成十万亿，调水的成本假设每年是一万亿，可以拿这十万亿跟这一万亿来比嘛。我们可以算一算东部用了多少水资源？东部的水资源支撑了多少 GDP？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它能够支撑、保卫足够大的经济，就可以认为这个水值得调。如果它不能支撑一块足够大的领域，那就不值得。要从一个很宏观的视角来看问题，不能简单地从单纯的财务指标上来算，你怎么算农业也是承担不了这个水费的，这是肯定的。

刘明辉：以前从很多朋友那听说过邓英淘，但不太了解。这次读书会说到这几本书，时间原因我没有从头读到尾，但大致内容翻了下，把〈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这个访谈认真看了。

我觉得邓英淘特别敏锐，80 年代提出“多数人的现代化”这么深刻的问题，那时我们刚刚提出要搞现代化，各方面都还想不到发展方式这个高度，只是解决当时经济问题的一些办法，但他能这么敏锐地思

考，这么深邃的角度，把当前问题与国际经济战略格局、体制改革，更主要是和发展方式结合起来，这么深刻的角度，一般人做不到。更重要的是，他有这种想法，又能够脚踏实地、身体力行。他到处去调研，一些很细小的东西也研究，来验证他的理论，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往往是有想法的人多，真正能够落实到实处的人并不多，这非常不容易。在他得了绝症，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生死置之度外地考虑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问题，这种感觉我以前从来没有。小强写的“堪称一代楷模，定将载入史册。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我认为是非常客观的评价。

邓英淘的整个思想，提出的这套方案，可能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需要考虑和解决，我觉得至少方向和前景没有问题，我不知道它在学术理论界、思想界及决策层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或有多少人理解、了解和认识到它的重要价值？我不知道现在是一种什么状况，很关心，很想知道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王小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的问题。说到邓英淘的敏锐，以我跟他接触，感觉也很简单。1980年中国人均消费能源0.6吨标准煤，十亿人口，现代化学美国，现代化到美国水平，就是110亿吨，当时全世界消耗86亿吨。这算术敏锐吗？小学一年的乘法。但是，他把这算术当真了，当成自己必须面对和回答的责任了。提出问题，有责任来回答。这是他难能可贵的地方，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就是这个概念。

刚才念“这是一条死路”这段话后面，邓英淘接着说发展方式的跃迁，“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发达和现代化之路，此乃数百年未有之变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或可谓之。”³与此同时，他临终前说得较多的一个词叫“形格势禁”，形势比人强。比如现在咱们满世界找油，可

³ 邓英淘：《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第216页。

能美国人跌破眼镜了，没想到中国人找油这么厉害，明明没油的地方能找着油，明明打不出井的地方能打出井来，明明形不成量产的能量产，于是赶紧设军区、动乱、阿拉伯之春等。现在总书记再次强调“两个一百年”，共产党 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2049 年，就是 11 届三中全会定下来的世纪中实现现代化。如果能源问题不解决，现代化怎么谈？邓英淘的思路，利用开发西部的矿物资源，同时调水+种草，走生物能源这条路，利用风能、水能、太阳能，正好在资本主义走向没落的时间点上形成一个发展方式的新旧交替，这个交替一走出来，那就是后资本主义时代了，就给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一个新的努力方向。如果不是这样，走不出来，前景不容乐观。

丁宁宁：我尊重邓英淘主要是他的理念，而不是具体设想，我尊重他的“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这个目标现在没实现。先富起来一部分人，将来能不能带动后富，现在看从制度层面没有解决。

关于调水问题。他病之前我跟他接触多点，到他家里跟他争论。我是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关于中国能源的缺能问题，从 80 年代中大家就没有异议，但怎么解决中国能源问题，现在的意见实际上很分歧。比如最近几年我们搞那么多风电、太阳能，我认为是胡来。太阳能和风电，就目前技术水平，像小强说的，只适合分布式使用，不适用集中往电网里输。我们建了一堆的风电厂，给某些人一些机会去挣风电的钱，其实就跟我们现在盖的鬼城一样，根本没用，因为它不联网。

现在的能源在一百年里离不开化石能源，为什么？它的开采成本再高，一千米以下的煤层开采，也比生物能源的收集成本便宜得多。把秸秆、草收起来得烧油，还得用电，从能源角度来看得不偿失，目前也没有那么大的面积来搞。中国人住的一百万平方公里，就是家家户户都搞太阳能板也不够你消费，而你要在西部搞，输到东部来，这本身又不合

算了。中国不是能源用量太多，而是利用效率太低。把全世界高耗能产业都集中在中国，把垃圾留在我们这儿，产品给人家。太阳能不就这样吗？我们生产最污染环境的硅板出口，人家去加工变成高附加值。对中国来说，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根本问题恰恰是应当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改变产业低端现象。这方面我们被西方人洗了脑了。中国人如果不搞自主，不往高端努力，搞房地产，就是一种自杀行为。房地产本身不产生价值，它只能提高其他产业的成本，说它是财富，那个财富是空的，因为如果那个财富没有人去住，它就没有意义。这十年最大错误就是去搞房地产，而没有真正去搞产业转型。

我不同意刚才小强说的两头在外是错的，这恰恰证明了中国经济和老百姓的生命力，中国将来还要两头在外。为什么不能用国外的能源？俄罗斯能源不就往这输吗？哈萨克斯坦也是往这输的。只要中国人足够聪明、勤劳、有创新能力，就可以用我们的产品来换能源、换油气，而且也不怕美国的封锁。现在美国有的我们不也可以有吗？我和英淘比较一致的是我们从来不信西方的邪。这点是对的，不要被西方新自由主义洗脑，也不要吧西方的东西都说成坏的。新自由主义导致金融危机了还不反思，一块儿去解释美国人还会好起来的，是自欺欺人。在制度和建设上，对邓英淘最好的纪念就是我们要拿出新的思想和新的意见来。

西部大开发调水方案，国家计委讨论过若干次，我参加过一次，各部委提出工程上各方面困难，目前条件下没法实行。我对英淘是尊重的态度，但你得把这个东西完善，能说服人才能够执行。他病后，我没再跟他争论这事，他的努力已经够了。他努力的最大亮点有几个，一是说明南疆盆地，那个地方不像河西走廊有西风带，如果真有足够的水，它会形成小气候的。二是把林一山的東西总结了，河流的摆动规律是很大

的贡献。三是能想到利用其他能源来提水，西线调水，需要提水。这都是他的贡献，但在方式上没有到说服人的地步，所以没有执行。谁要想继承邓英淘这套思路，就先要把他思路中每一个细节完善，起码得把这个框架完善到能说服政治家拍板，目前还没到这个地步。

另外，提出调水有没有考虑国际影响？当时跟英淘讨论过。要调一万亿立方米的水，东南亚就少一万亿立方米的水，是有国际争端的。要解决这个争端，我的办法就是周边马歇尔计划，要让所有周边国家来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用这种方式才能够解决争端。否则怎么调水？像现在刚修两个小水电站，集体抗议，你要调万亿立方水，没有东西换，调不了。从外交角度讲，你的水全流到东南亚，你要调一立方米的水也是必须经过国际协商和协议的，不是随便能够调的。

真正能解决问题还是热核。大家不要以为热核好像很远，中国现在有几个走的比较快，一是高温超导，它最大用途是可以为核聚变提供足够的电力，这个现在大家都有共识，这方面的进步我觉得现在应该关注。不是说分布式能源绝对不对，循环式能源绝对正确，我要表达的是在化石能源出来之后，目前没有足够的例证能够说明它能被替代。

崔鹤鸣：西部调水，英淘强调是一个典型的序贯决策过程。东、中线南水北调，不把全线修通，北京见不着一滴水，西线不是这概念。西线跨经若干个流域，调水的分水岭是巴颜喀拉山，北边是黄河，南边是长江流域。长江流域距离巴颜喀拉山的水口正在设计中，在那儿已经立了碑，小强我们已到那儿看了。那是一个隧道，巴颜喀拉山穿过去就进入黄河流域了，离那儿最近的长江支流就是大渡河，大渡河依次向西到雅砻江，还没碰着阴山，水量是逐渐增加的。从长江再往西南走，才走到云南、西藏，才走到上万亿方水的来源处。它的实施，完全可以变成若干相对小的工程，一实施就立刻见效，越是初期的工程，经济效益

越大。黄河上游水库、装机全部都是修好的，只是没有足够的水，因此发不了电，在那儿停着在等。第一期工程，黄委会早就进行了规划、勘探，甚至可以立即进入施工图设计，就是大渡河引 46 亿方水进入黄河，渠道一共不过几百公里，因为距离近，成本很低。这 46 亿方一进黄河，一系列的水库装机容量就利用起来了，一个新机器也不用装，都在这儿等着呢。黄河上的这些水库，我们过去基本完成了连串，全部已建设完毕。

大西线调水是一个不得了的宏大工程，甚至可以叫中国的世纪工程，但不要认为它一定要全线开工，那个决策谁也做不成。序贯决策，就是派一个先头兵出去，46 亿方水调过来了，看一看，总结经验，大家觉得好，再慢慢往前推进。长江的支流正好和巴颜喀拉山是平行的，只要距离往前推进几十公里，就增加多少立方的水，这是可以一点点地往前推进的。派出去先头兵要花多少钱？比南水北调中线、东线方案都省太多，效益又大太多了。中线、东线没有发电问题，基本上也没农业灌溉问题。可是西线上来就是发电，发完电就变成农业用水，农业用完下去就是城市用，大家都一块用这个水。所以宁宁的说法要纠正，西线非常非常特殊，它是一个典型的序贯决策问题，是一个可以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推进的问题，是可以随时叫停而没有任何损失的问题。比如修到雅砻江，大家觉得够了，咱们别再往前修了。现在小西线的勘探等早就完成了，为什么大柳树上不来？关键大柳树淹的都是甘肃，效益都在宁夏，这就是当时上不了的基本政治问题。大坝在宁夏，大坝上面整个那么庞大的库区，把甘肃的水域全部淹完了，光移民得多少万人，甘肃不干，是这么一个问题。

原来技术上唯一问题就是地震，因为大柳树的坝址就压在活跃地震带。为了上大柳树，50 年代的国家经济多弱呀，周恩来他们这一代人居然能够做到，在新疆几个地形类似的地方，修建实验工程，观察地震

带动水库的位移，整个工作一直延续至今，研究大坝地震问题。现在工程界认为大柳树这个坝没有问题，完全应付得了地震。我们真不理解，用不着国家任何补贴，纯粹财务效益就非常好，只说这个大柳树，没有说更大的，所以不存在大西线是不是上的争论。

张木生：宁宁的讲法和提法都很好，大家把不同意见都提出来。说风能是垃圾能，太阳能污染严重，但搁到沙漠上，搁到风足的地方，把垃圾能和调水、提水搁在一块总可以吧？英淘他们设想的引提并重、东西对进、调补兼蓄这个方针，刘源读得很细，说你们讨论时把我的思想也补上，就是说这个由小到大，由近到远，由易到难慢慢摸，只要这个方向对了，慢慢来。既然叫序贯决策，它和摸着石头过河有类似性，所以我们多讨论邓英淘“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大的思路，具体要破题的事太多了，咱们现在先多讨论点方向。

李波：我不是相对历史观的信奉者，所以我也不相信线性进步论，在哲学上、战略上很赞同邓英淘及刚才小强谈的这些道理。

资本主义厉害的是创新，它不怕风险，能消化风险，但这个创新会带来很多对人类的破坏。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有这样一种批判，这两者是互动的，我这个思想跟邓英淘有点不同，不是说资本主义就此消灭，在工业革命结束后就此消灭了，而是在信息化社会中可以带来对人类文明的延续，社会主义思想跟资本主义思想是一个永远相对的对子，会进行不断的斗争。

黄纪苏：议论一下邓英淘的精神。邓英淘是邓力群的儿子，应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红后”。这几天晚上天天看书，觉得非常震动。具体怎么调水，我没发言权，坦率说那些没有非常吸引我，最震动和吸引我的是邓英淘的精神。

最早是从王小强那儿听说邓英淘，当时我觉得他们那么旁征博引，博览群书，要把那些问题给全弄遍了，这种书写方式能把自己写死。应该说，邓英淘其实就是写死的。这种精神到底是哪儿来的？应该看成是一种中国革命的遗产。中国革命起于近代大危机时期，需要有人有比较高的境界和比较大的志向。中国共产党当年起来，不是穷棒子，就是穷书生，这些人的确有一些特点跟国民党不一样。毛主席也说过，共产党比国民党的文化水平要低。但共产党的确有一种特别朴素、刚劲、敢死敢冲敢往前闯的劲儿，这在中国革命以及建国、建设中起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随着“文革”的破产，中国革命也开始分裂，最后到了我们这三四十年基本是一种溃败、溃散的状态。中国革命破产，狭义上最直接表现就是影响了后代。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好的时候会比一般人强，坏的时候会比一般人差。原来他们是住在理想主义天国上，当他们从理想主义天国上掉下来时，不会掉在地面上，而是一定掉在地狱里。中国革命的遗产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邓英淘他们这些人。中国革命当时那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今天应该依然闪光，在他们身上体现，让我感动，这是真正的中国革命的伟大遗产。

陈越光：认识邓英淘也是多年。2005年我在《中国科技》杂志做主编，做过他西线调水方案的专题。他去世前几个月我去医院看他，跨越30年，还是那个人，始终是目光炯炯、言词滔滔，始终是自主发展模式，为国家鞠躬尽瘁。跟他打交道有难有易，难的是要跟他有个人交情和个人情谊很难，他没什么个人的事和话跟你说；易的是你要跟他说话问题很简单，非常简单。当他讲问题时只有问题，没有其他的東西。我们这些80年代过来的，现在都60出头，正在从面对生转向面对死。人生中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楷模式的人？我觉得邓英淘算一个。刚才黄纪

苏讲了，他背后的就是中国革命的精神，我想没错。没有谭嗣同的《仁学》，没有谭嗣同所谓的历史精神，能有后来的中国革命精神吗？没有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能有后来中国革命的精神情怀吗？邓英淘身上有这个情怀！

第二，邓英淘这本书对当今世界的意义。96年后我在非洲和南美考察社会问题，有一种心态是中国做的很不错了，所以有很多可以跟南美、非洲的工作者交流，或者说传授经验。但我碰到很多南美、非洲人对中国道路表示很失望，甚至极端地说是失败的。他们说你们所做的一切可以炫耀的数据，西方人都做过了，你们所谓的成功，也就是这些了。这对我很刺激。2001年开始，针对达沃斯论坛有一个反达沃斯论坛，一个口号叫做“另一个世界是可以的”，从南美到非洲、到亚洲，他们所有的方式都是以现有西方世界为对立物，用相反的方向论证自己。当然，我认为这样的路走不长。我相信邓英淘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道路如果在这方面能够走成，是可观的。

第三，2005年我为了西线调水的事情请教过杜老，也几次去拜访林一山。当时认为最不可行的有两大问题，一是那条线路上是地震活跃区，技术上那么大的工程难以行得通，甚至说连技术认证的条件都不具备。二是大调水在国际水域面前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最高决策层没有态度，执行部门不可能有先行的步骤。但现在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就是小强采访邓英淘中，提出了风能提水、超长隧道和跨域用水三大思路，和当时情况已有很大不同。一旦到了可以用现有技术条件小区域、小范围立竿见影地做一二个试点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推进到项目论证的地步？到了化整为零，甚至是不是在小区域里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若干部门支持下，可以做到小项目试验？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万晓西：邓英淘的研究，水和土地，其实还是怎么吃饭的问题。中

国和各发达国家发展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历代文明也都是靠着河流发展起来的。从地球讲，71%的面积是海洋，29%是陆地。今天新闻说，再过50年，人类要往月球移民。我觉得未来更长远的发展可能向海洋扩张。近几年，海水淡化成本降得非常快，2011年报道降到五块钱，现在三四元，成本完全可以接受。从更长远的战略来讲，我觉得要解决海水淡化，东部城市大多靠沿海，水利部2011年《水资源公报》讲东部耗水占36.4%，至少水资源暂时得到很大的缓解。

夏海宁：中国现在形式上是富裕了。看了邓英淘书的话，可能感受更深，无非就是把地下化石这些能源翻到地上来，把财富变成GDP，中国好像就富裕了。如果按这个标准，中国把地下的物质挖完后，中国的GDP是不是也就停止了？

书中讲到的多数人的现代化，我觉得他的立论是想到了能源、资源的有限性，所以我们应该走怎样一条道路。反过来想，如果没有这样一种限制，是不是就可以采取其他的发展方式？不管是化石能源还是水资源，肯定都是有限的资源。就算解决了水、能源问题，人口问题、空间问题也都解决不了。贪欲的问题，人性的贪欲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没解决。美国经常被拿来作楷模，但其实美国有很大问题，华尔街人收入大概是全美国人平均收入的六倍。美国的市场经济成分是很重，但并不是一个纯的市场经济，科层制，简单说政府干预的力度也很大。即便这样，美国也解决不了，所以只能规定最低工资，没有办法规定最高工资，政府的干预还没有达到这一块。

崔之元：我和邓英淘、小强这些人认识于80年代初，当时我边缘性地参加发展组一些调研活动，后来和邓英淘合写了《南街村》书。我想补充一个信息，小强在香港出这三本书，是他的一些最新成果，但他

以前很重要的，比如〈广义恩格尔定律〉、和小强合写的〈鹤岗经验的普适性〉等一系列散见于各种杂志的论文，编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两三个月前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是他的一个论文集，和小强出这三本书没有重复，也可以作为纪念他的一个形式。

梁晓：刚才大家注意力都集中在调水和怎样调水上。邓英淘还有一句经常说的话——“振兴偏瘫巨人”。为什么说《再造中国》？不是说调水开发大西部后，一百万平方公里的东部就不要了，东部那些产业也不要了，而是说在现有的轻纺工业大进大出的这条路走不下去的时候，西部大开发，在西部资源所在地发展重化工，不是光做天人合一的小村庄和小的经济体。著作里，《再造中国》、《西部大开发方略》全部都有分析，在西部有水以后，可以充分利用中国那 90% 的资源 and 能源去开发重化工。换句话说，西部大开发，意味着从外贸依存度高达 70%，转变到对外开放环境下自主发展，转变过度依赖他人的发展方式。

继续原有模式大进大出，不要低端的、污染的，我们要做重化工的、升级换代的、高新科技的，行不行呢？理论上可以，实际上美国会把你掐住。当年中国的大飞机就是跟麦道合作的，波音兼并麦道后，中国大飞机项目就停掉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至今仍有近百页的目录，列明禁止对中国出口的高技术。麦当劳可以过来，可口可乐、耐克这些都可以在中国做，但是新技术、高精科技不可以在中国做。

油气资源也是这样。我们在非洲做了很多援助，互惠能源，援助完以后呢？帮助的项目很多，能源投资很多，结果招来美国建军区，闹动乱。再说亚洲周边国家，在做中缅油气管道的同时，我们在缅甸援建大坝、也做一些社会公益项目。我们是跟军政府谈的，差不多完成了，缅甸政府民主化了，西方国家领导人轮番会谈昂山素姬，跟刘晓波一样诺贝尔和平奖，好莱坞还拍大片，昂山素姬要求修改宪法（因为她丈夫和

两个儿子都是英国人)，竞选总统了。缅甸被西方国家评论成民主发展的样板。南海、东海闹得建成多年的春晓油田，泡在海水里锈蚀。提这些痛心事，不是说和平发展的努力不对，而是说简单继续原有模式大进大出，回避不开邓英淘提出的“三体”问题。

薛玉炜：在座中可能我跟英淘接触时间最长，88年体改所之后，我到了社科院，跟邓英淘一起工作，一起做课题。97年成立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马上开始调水项目，当时我负责中心其他的事，就没参与。刚才大家都集中讨论大西线调水，我觉得英淘的思想远远超出这个范畴。大西线调水调研完之后，直到12年他去世十年时间中，任何地方只要出现新能源、新技术相关的一些点，包括农村，以及一些地方的科学院，我们就通过各种方式去调研、去谈。围绕多数人的现代化，有个很大的课题，就是分布式能源。刚才小强也说了，很多现代的能源技术都不是集中的，从利用和节约的角度来讲都是分布式的能源，如何把分布式能源和多数人的现代化结合在一起，这是他最想做的，但他没有时间做了。

调水调研完后，第一，因为调水不能马上实施，我们就集中在东部水的利用上，沿着黄河、淮河、辽河从头到尾去走。第二，英淘想把这些想法投射到整个农村经济，有几个基本设想。首先，农村人住哪儿？这是城镇化道路的问题。其次，产业支撑在哪儿？我们基本观点是现在梯度往大中城市转移后，大部分人还是要回归到以县城或中心镇为主。假如有两千多个县级单位，也许有一些可能会有工业的支撑、工业的基础来促进人的聚集，另外以农业为主的县城怎么办？除了刚才讨论这些议题外，英淘的体系里还有很多可以去落实和做的。

刘江南：今天大家讨论了很多，一些具体的方案，怎么去解决和实

现，方案可以存疑，但有一条，英淘这么一个人，一生为了他这么个理想，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一直奋斗到最后一瞬间，这个精神我们是毋庸置疑的，这是我们今天读书会最主要的一个主题和最大的收获。